

往事如昨

# 拜谒列宁墓

## ——写在列宁逝世100周年

孙桂廷

在我读初小的课文里,有一篇《列宁的外套》,讲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,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和第一任元首,列宁仍然穿着破旧的外套,袖口破了,有好几处打了补丁,但他不舍得换新的。每当听到有人讲起毛主席打了73处补丁的睡衣,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列宁的外套。

### 听伯父讲列宁

我的伯父只有一个儿子,在8岁那年饿死了,他把他的侄子侄女,也就是我们兄弟四人还有两个姊妹视同己出,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和成长。

有一次,伯父要我读课文给他听,我读的就是《列宁的外套》。他告诉我,他曾近距离听过列宁到工厂的演讲。还有一次是列宁格勒(圣彼得堡)“五一”工人大游行,他在很远的地方看到过走在最前面的列宁。当时,尽管老师告诉我们,列宁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,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内涵。那一次,伯父还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唱了一段《国际歌》。

我哥哥曾经问伯父,列宁长得什么样?伯父说,列宁个子矮,秃顶,讲话喜欢用双手捏住前胸的衣裳,说话声音很洪亮。

我读初小时,曾被选进招远县城办的小学生俄语试点班,学员是来自县城周围各中心小学选出的十六名小学生,地点在县委门旁的游艺室,由一个叫于志三的老师教我们。

我开始不会发那个俄语字母“P”,即舌颤音,也有人叫它嘟噜音,是伯父反复教我,首先学会了“乌拉”的发音。其实俄语“乌拉(YPА)”的“P”字母,就是那个嘟噜音,伯父说乌拉是一种表达强烈情感的语气词,通常用于表示胜利、喜悦或兴奋的场合。官兵在冲锋或阅兵时经常高喊“乌拉”,通常被翻译为“万岁”。不过伯父告诉我,听前苏联人讲,列宁发不好俄语里的嘟噜音,包括YPА,其实列宁名字里的弗拉基米尔的“尔”字,也是这个舌颤音。

后来,我读中学了。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列宁在1918》两部电影我看过多,列宁的形象就像伯父告诉我们的那样。我相信伯父真的见过列宁。

### 中学开始读列宁的著作

1966年夏,我刚在招远一中升入初二,就赶上了“文革”。后来到初中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,即使最后的复课,也没有按部就班地上

过多少文化课。其间的大部分时间,被同学孙为刚戏称为“参加了职业革命”。我从这一段时间到高中的几年,数理化学得不怎么样,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的著作倒是读了一些。

我曾经读了马克思、恩格斯合著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几个版本,最初一个版本是上下排版、自左而右的,还有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其它著作,如《雇佣劳动与资本》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等。但我比较喜欢读列宁的著作,抑或与伯父赞赏列宁有关,并且我认为列宁的文笔比较犀利深邃,特别能够深入浅出。比如他解释“共产主义=苏维埃政权+电气化”,简明扼要,极为形象。“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,而是看他的行为;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,而是看他做了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。”现在的译文简化为“判断一个人,不是根据他的自己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,而是根据他的行动”。

那时候,老家招远县新华书店的书架上,经常出现老版本的列宁著作,如《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》《国家与革命》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等,有些是竖排的版本,一毛六分钱一本,我用省吃俭用的零钱买到后,这些书成了我熟读的课外读物。

上大学时,我的政治课老师、政治系主任王国洪教授问我,是否读过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,我就把我买的那本纸质已经变暗黄的老版本递给他。我以为他是在找这本书备课。他发现书里面有很多我划过的重点线,个别地方还有小点评,就对我说:“这课还是由你来讲吧?”“我哪敢?哪有学生给自己讲课的?”他见我胆怯,鼓励我说:“我发现你的马列学习有功底,希望能够结合八级工资制等问题向同学们介绍。”

当时,我们英语系同一年级两个班的同学正在烟台罐头厂学工实践,其中安排了一个下午要我在工厂附近西南河的仓库里讲那堂课。两个班的同学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参加了听课,课后有些反响。给另一个班上课的邹美林老师对我说:“今天下午的课,你讲得太好了!”多少年后,我有个同班同学说起那件事,问我:“你那次给同学讲课,上半场连一口水都没有喝,你还记得下半场讲课时,是谁给你端上一杯水放在讲桌上吗?”尽管当时我没有注意到,但恰恰就是那个把水端上讲桌的女同学,毕业后成了我的恋人,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。



# 压咳嗽

潘云强

母亲咳嗽时,会吃萝卜压,这是她最常用的方法。有一种长得白白胖胖、个头挺长的萝卜,止咳效果较好,但那时母亲并不知晓。她喜欢那种前面带青头、身子粗壮的萝卜,烟台百姓称之为菜萝卜。这种萝卜没有白萝卜大,也不如现在的水果萝卜长得俊俏,但萝卜肉质紧、水分少,做菜实惠,用老百姓的话说“出货”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没有反季节的蔬菜。除了夏秋季,其他季节基本上都是白菜萝卜当家。母亲用一个大瓷盆,放上菜铳,把洗净的萝卜拿来,按在菜铳上打。母亲习惯先打萝卜腚。萝卜变成丝后再放到沸水里榨,捞出挤净水分后,剁细,和上肉馅,包水饺或包子。萝卜打到最后只剩一截萝卜头时,母亲便不舍得打了,习惯将它放到枕头边。

母亲幼时便和大人一样干活,落下了咳嗽的病根。那时农村普遍缺医少药,人有病大多找点偏方治。如果半夜咳嗽了,母亲顺手从枕边拿起萝卜啃几口,会好一些。这就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“压咳嗽”。

当然,母亲平日也喜欢吃萝卜。那时水果少,母亲将萝卜当水果吃了。萝卜有点辣,稍带甜头,咬一口嘎嘣脆。另外,萝卜化滞消食、上下通气的效果也极佳。

母亲还注意收集一些生活偏方。在她那里,压咳嗽的方法还有不少。例如她常用生姜末煎鸡蛋。我小时候到处跑,受了风寒后,没少吃这一口。她采用最多的是用百合、梨、萝卜等分别与冰糖熬水喝。大枣也金贵,偌大一锅汤,加三五个大枣就不错了。那时生活条件艰苦,孩子们很少见腥,这些东西算是补品,可以增加营养。

感冒了,母亲还有一个方法也屡试不爽。即用洗净的葱根、香菜根、大枣、姜等烧水喝,喝完睡一觉,出些汗,醒后身上会轻松很多。上山干活时,母亲还会挖些婆婆丁在家备着,无论是生气上火,还是小便赤黄,用婆婆丁烧水喝,也能去一大半病根。

俺村有不少杏树,过去的杏树品种多为小草杏,里边的杏仁是苦的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,苦杏仁含的苦杏仁苷能止咳平喘,但量大了有抑制细胞呼吸的作用。有一次,父亲咳嗽得厉害,晚上尤甚。母亲使用苦杏仁配上菊花,让父亲泡水喝。父亲嫌麻烦,有时直接把杏仁放在锅底灰里烧烧便吃,谁知却惹出祸端。也许是饿的,抑或苦杏仁烧熟后散发出那股清香的诱惑,四五岁的我趁大人不注意,依样学样,也拿了一大把在灶坑里烧着吃。妈妈发现时,我已口鼻青紫,昏迷不醒。用灌绿豆水、催吐等民间偏方,好歹挽回一条性命。

以上这些东西,与蜂蜜比起来,那是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那个年代,蜂蜜可是高级补品。俺家有一罐蜂蜜,被母亲当成灵丹妙药。蜂蜜用一个罐头瓶子装着,瓶子用布裹了好几层,并用线绳仔细捆绑起来,锁在小柜里。在母亲眼里,蜂蜜乃上品,能跟所有东西配伍。孩子们头痛感冒、咳嗽上火、食欲不振甚至精神差,都可以用蜂蜜调理。每年春天,空气中乌央乌央的,让飘浮的杨柳絮“焚”了(方言音,太多了之意)。姐姐会因花粉过敏引起鼻子堵塞难受。还未开春时,母亲就用蜂蜜白萝卜烧水让姐姐喝,她还风趣地把这叫孙悟空见猪八戒先倒打一耙,为的是提前给猪八戒一个下马威,免得它日后调皮捣蛋。其实母亲是治未病。如此这般,姐姐春天极少过敏了。另外,我也常常看见母亲用绿豆、芝麻、香油等当引子治些小病小灾。

但偏方并不能包治百病。有一次,母亲患了感冒。起先她没当回事,以为喝点葱根水就好了,结果没压下去,又喝蜂蜜水,也不灵光。改革开放之前,在农村,包括像我母亲这样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,看病费用完全由个人负担。母亲怕花钱,坚决不去医院。但持续高烧不退,她还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,父亲不由分说将她拉到烟台山医院。经诊断,她是流感引起的肺炎,经住院治疗,方转危为安。